

中國政治系列①

中國人的政治心理

美國政治學會會長・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斐魯忒(Lucian Pye) 著



中國政治系列②

斐魯恂 著 艾思明 譯

中國人的政治心理

中國政治系列①

中國人的政治心理

著 作 人／斐 魯 恂

譯 著／艾 思 明

發 行 人／彭 懷 真

發 行 所／洞察出版社

地 址：臺北市10037懷寧街62號 8 樓之 2

電 話：311-6959 • 331-8875

法律顧問／葛 苗 華

地 址：臺北市松江路200號402室

電 話：511-7104

印 刷 廠／海王印刷廠

地 址：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電 話：223-1327~9

劃 撥／0785532-9 鄭台芬帳戶

行政院局版臺業字第3703號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初版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價／180元

目錄

第一章	現代化過程中的權威危機·····	1
-----	------------------	---

第二章	意識型態與階級服從之關係·····	11
-----	-------------------	----

同情在反應民意中所佔的地位

良好的政治秩序是偉大成就的基礎

權威危機與侵略性行為

第三章	缺乏現代化政治人物的政治·····	31
-----	-------------------	----

反對知識的逆流

既深且廣的政治層面

第四章

歷史的包袱

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穩定的認同感和社會變遷

中國文化中造成挫折和無能的主要價值觀

41

第五章

仇恨的浮現

政治覺醒後的憤怒

化悲憤為力量

敵友分明

57

第六章

權威、自律和秩序

權威的神聖性和秩序的維持

73

第七章

父權的勢微和對新權威的竭力追求……………

91

混亂的恐怖感

侵略的抑制與友誼的理想

向一切權威挑戰

表面的服從和無奈的接受

直接的衝突及徬徨的記憶

第八章

意志力與道德·行為的推動力……………

107

暮氣沉沉的官員和勤勞奮發的人民

懶惰的害處和意志力的鋒銳

反省的危機和幸福感的重要

避免做選擇、避免負責任

第九章 團體行動和團隊精神

137

人際關係至上

穩定、升遷和機會主義

認同感的需求及忠誠的回饋

複雜的情感

第十章 人民公社

165

用逃避現實獲得心靈的滿足

在前進的聲浪中開始後退

想要激發人民的自發性卻製造了更多的仇恨

重視形式主義的行政組織和不切實際的計畫

以意志改變現狀

第十一章 未來的展望

革命和極權制度所要付出的代價
無可挽回的事實

第一章 現代化過程中的權威危機

現在的中國（共）不僅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同時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奇怪的是，雖然一般大眾傳播媒體和政府官員都注意到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學術界却似乎沒有留心到這點。學者在研究其他亞非國家政治經濟發展時所用的一些概念及理論，幾乎完全沒有被拿來分析中共。久而久之，研究政治經濟的學者和研究中共的學者之間便出現一條鴻溝：大家各走各的路，很少有交換研究心得的機會。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似乎深深地以他們的研究主題爲傲，急於向世人說明中國對世界的重要性。他們不自覺地讓人有種印象，就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和中國比起來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們也讓人以爲，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和其他開發中國家完全不同。相對地，研究發展理論的學者則始終拒絕承認中國（共）在學術領域中的重要性。此外，他們也認爲共產主義並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學術課題。雖然研究發展理論的學者應該避免受到個人好惡的

影響，但是大多數學者還是堅持民主化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這種反其道而行的例子也就被乾脆地犧牲掉。其實，早在人們完全了解到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碰到許多困難之前，中國就已經走上了發展的道路，這使得我們更加懷疑那些學者怎麼能忽略這麼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的話，相信將會對中國在廿世紀的表現有另一番評價。在一九二〇和一九三〇年代，西方學者、記者和外交家一致給予當時中國很低的評價。因為他們比較的標準是歐洲那些現代化較早的國家，而不是後來獨立、相繼躋身於開發中國家之林的國家。當時中國正在試圖掙脫傳統的束縛，西方人士都還不了解政治經濟發展是多麼複雜的一個過程。因為中國是當年全世界唯一的一個獨立的發展中國家，而現在的發展中國家當時都還是殖民地。也因此當時的先進國家不像現在那樣能夠容忍發展所帶來的暴力、混亂，甚至無能。

在當時唯一能夠拿來和中國相比的國家是日本。但是日本所具備的發展潛力是獨步全球的，她的現代化速度也無人能及。不過，由於日本曾經從中國輸入儒家和佛家的文化，因此許多人便拿日本的水準來判斷中國所具備的潛力。

但是這個時代的中國偏偏看起來就是一無是處。在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先有袁世凱的稱帝，繼之有軍閥亂國；此外，孫逸仙博士的經濟計畫並未發揮預期的效果。大學生雖然掀

起了民族主義的浪潮，但却未創造出實際的成就。儘管國民黨一再宣傳她的改革成功，終究掩飾不了貪官污吏橫行的真象。這一切都讓人懷疑中國人到底有沒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配不配做爲一個國家。當時分佈在全世界各個角落的殖民地，在歐洲國家的鎮壓下維持了表面的平靜，所以歐洲國家更找不到判斷中國表現的適當標準。

到了今天，大多數的殖民地都已經獨立。他們在獨立後的表現似乎不見得比當年的中國強。這些新興國家大多處於軍事統治之下，和中國當年飽受軍閥蹂躪之苦有相通之處。事實上，在軍閥橫行的那段期間，中國有着令人鼓舞的知識發明和交流，可見軍事統治對中國發展的妨礙尚不如對其他國家妨礙之甚。

如果我們以今日的亞非國家做爲衡量的標準，那麼我們必須承認三〇年代和四〇年代的中國確實有長足的發展。在這段期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學習現代化的生產技術；主要幹部在許多方面都具備了「已開發」的水準，這些人雄心勃勃地想要將中國帶入現代化國家之林。許多人認爲八年抗戰暴露了中國的弱點，事實上，這場戰爭只顯示出一個轉型中國家所表現的可觀力量。我們很懷疑目前是否還有任何發展中國家能像中國當年一樣，在幾乎沒有外來援助的情況下，長時間地動員全國大部分的人力、物力。和中國有戰時合作經驗的美國人大多對中國的表現感到沮喪和失望，但這是因爲他們對盟邦要求過高之故。今天的美國人則很明智地降低了他們的要求標準。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拿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和其他國家的政治發展相比可說是件相當不公平的事。我們之所以要這麼做主要是爲了從中國的發展經驗當中，找出那些問題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所必須共同面對的，而那些問題是中國所特有的。雖然我們還不能肯定中國的成就有多高，但是至少我們已經開始將她發展過程中，平常的一面和特殊的一面分開。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比較有意義。

中國人普遍認爲，由於他們過去曾經擁有偉大的文明，因此他們現代化的經驗一定和其他不具備這項條件的國家大相逕庭。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是一個遭到劫難的巨人，而不是一個試圖適應現代化生活的老頑固。

這便是中國近百年來無法應付外來強烈挑戰的關鍵性因素。由於中國人迷戀於他們過去偉大的成就，因此不肯從事那些必須要做的劇烈改革。他們認爲偉大就是偉大，中國有優秀的傳統文化以及一部份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們在適應現代化世界的時候，比起其他國家的處境，應該是有多，這些有利的地方必將爲他們帶來貨真價實的發展。由於中國一味的懷念她過去的光榮，因此無法積極地求新求變，達成現代化的目標。

不過，中國的現代化經驗確實和其他開發中國家有着極爲重要的不同之處。中國人說他們受西方帝國主義之害最深，所以中共主張他們爲所有發展中國家樹立了「中國式的發展典型」，這

倒是有些誇大其詞。無論如何，中國的發展經驗是有些與衆不同。

中國和其他開發中國家的第一點不同之處，是她沒有經歷過大多數國家曾經面臨的認同危機。就中國而言，基本問題是如何在現有的政治社會環境下獲得新的權威型態。這種權威型態不僅要能滿足他們重申她民族自信心的需要，同時也必須提供她現代化社會的基礎。

中國人的這種民族自信心對她的國家發展有着相當複雜的影響，關於這點作者將在稍後予以進一步的說明。此地我們只需要知道在近代歷史上，中國人毫不懷疑他們是中國人。他們和外界的接觸程度越深，這種體認就越強。事實上，他們這種對文化和社會的認同感，在許多方面消除了中國社會中地域、階級和語言不同所造成的差異。因此，中國人在心理上絕不會弄混他們所具備的身份，相反地，他們的問題是出在中國一天天地貧窮和衰弱，不再像往日一樣的富強。也因此，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他們一直對他們的領導者感到不滿，也希望建立起真正行之有效的權力中心，這便造成了所謂的權威危機。

權威危機之所以發生，部份原因在於政治權力合法性的文化和心理基礎爲現代化的努力所破壞。特別是當傳統的政治權威很明顯地無法因應現代化需要的時候，格外明顯。合法性永遠需要以實力做後盾；如果政治權威陷於無助狀況下的時候，她的合法性也就破碎了。除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發生問題之外，其他社會結構也同樣地無法得到人民的服從，使得權威危機的深度與廣度

都隨之增加。政治權力在失去宗教、社會和文化力量的輔助之後，社會結構便相繼出現權威的真空地帶。

權威危機變得更為嚴重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整個社會中最重要的社會化制度——家庭，也受到劇烈的衝突。然而，當它在受到衝擊的時候，雖然社會力量和經濟力量大為削弱，但是社會化的功能却極有可能毫髮無損。年輕的一代繼續從家庭獲得「權威」的概念；同時矛盾的是，家庭制度雖然遭受削弱，年輕一代的依賴性却反而增加。簡言之，儘管在現代化的壓力下社會結構有扭曲之虞，然而最基本的學習過程仍生生不息地在進行。受到家庭教育薰陶的人們也繼續對政治權威抱以很高的期望。

因此，我們若是要解決此一權威危機，就不是光靠建立合法性、新的信仰所能為功。人們對合法性所抱持的態度是來自早年社會化的經驗和稍後對政治社會化的認知；如果這兩者之間的一貫性和加重性受到破壞，那麼很可能會速成普遍的挫折感。早先的社會化經驗讓人無法輕易接受政治權威遭到削弱的事實，因為他們早已習慣於依賴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制度，政治權威的下降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他們的疑慮，引起挫折和侵略的本能；而侵略性行為的發生，不僅會調過頭來增加人們的疑慮，同時也會讓重新權威的工作變得更複雜、更困難。

因此我們可以從好幾個層面來討論權威危機的問題，最明顯的事實，莫過於它是促使當政者

爲新政府制度包上合法性迷思外衣的主要動力。不過，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因爲從他早年社會化經驗中得到對權威概念的刻板印象，使得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因爲他們一方面在找尋一個理想中的政治權威，另一方面又赫然發現現在現實生活中根本找不到這樣的一個東西，基於理想及現實的差距，很多人便開始難以控制自己的行爲。

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一般認爲是以西方對中國權威的挑戰做起頭。一開始受到威脅的只是清廷王室；但是隨着外國理念及實踐的大半入侵，儒家道統和君主制度也遭到波及。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不可避免地崩潰了。一九一一年之後，中國開始進入一個漫長的摸索階段。中國人急於找出一種能夠應付現代化潮流挑戰的權威型態，但又不希望全盤改變他們對政府所抱持的觀點。在一九一一到一九一六年這段期間，中國在君主立憲和共和這兩種運動之間搖擺不定。袁世凱死後，君主立憲的聲浪不復可聞，但是由於共和政府力量微弱，地方各省的力量駸駸然有和中央分庭抗禮之勢。

於是，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便成了重建中國社會的一大問題。在這方面，重大而微妙的經濟和社會變遷加深了問題的複雜性。例如，電報和鐵路的引進便會使得這個問題到達短兵相接的地步。因爲中央和地方很快都認識到這是一筆不小的財源，所以便競相爭奪。根據現代的財政原理，這種事情應該由中央來統籌辦理，但是長久以來歷代君王都在此一問題上賦予地方或多或少的

自主權。當然，省政府亦希望他們對在該省徵集的稅賦有優先支配權。

因此，中國的政治制度在一九二〇年代是沒有什麼權威可言的。中央政府根本無法動員足夠的資源，從事國家現代化和發展的工作；各省雖然也在積極推動社會發展，但這正好對中央的權威構成嚴重挑戰。中央政府力圖振作，却被視為對地方政府合法性的威脅。地方政府認為他們才是真正和廣大羣衆有着密切接觸的機關。在一九一六到一九二七年間，軍閥佔據了中國的政治舞台，權威危機的嚴重性也隨之增加。在當時的中國找不到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權威，能夠肯定地解決中央和地方之公家及私人，和家族及政府的紛爭。

處在這種權威危機之下的中國政府，根本無力推動國家的政治發展。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像以往的政府一樣深入羣衆，廣泛地動員人力物力。由於受到這種挫折感的不斷侵襲，許多人開始接受一黨專政的合法性，爲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相繼奪取政權預留伏筆。但是這並不代表問題獲得圓滿的解決，只要中國人還對政府合法性和權威的道德基礎有爭議，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就還像沙灘城堡一樣地不紮實。

在一九三〇及一九四〇年代，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領導人都主張加速國家發展的脚步；但是伴之而來的道德問題，却使人不得不重新探討政治和道德兩者之間的關係。權威危機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爲政府的權力缺乏道德基礎，而受到限制，同時她促使權力的合法性也因而遭到質疑。因

此國民黨越是想要達成可觀的進展，便越是令人懷疑他的真正企圖。

在這段期間，中國的政治課題一直圍繞在革命和民族主義上打轉。在中國革命，只是爲了一個單純的目的，那就是重新建立一個強大而完整的權力中心。因此中國的革命家從不強調他們是推翻一個強大而充滿壓迫性的政權。他們之所以革命，是爲了代表全國百姓爲新政府注入更多的權威。

中國民族主義和他人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是挾着排山倒海的猛烈聲勢而來，但是等到這股激情過去之後，却又變得無聲無息。這種來得急去得快的特徵並不會對民族認同感造成任何阻礙，但却可以證明中國人對家族的重視程度超過對國族的重視程度。

由於中國的政治文化一向是靠家庭來灌輸其成員權威的概念，所以必須爲此付出相當大的代價。通常家庭告訴他的成員不要對家庭以外的組織做太多的承諾，這對國家權威顯然會有負面的影響。

今天，我們從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的運動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同樣的問題又再度困擾着中國。革命所代表的政治意義是政治權威未能達到人民所期望的標準；革命者所要求的是一種比較有紀律的生活。同時中國人也正在摸索如何處理他們和家族以外團體的關係。

在我們進一步討論中國權威危機的心理層面之前，必須先回顧一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及社會